

朔州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后方 ——只泥泉

尹世铨 著

三晋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篇.....	1
引 言.....	2
第一章 清泉历史.....	4
第二章 马邑山边塞文化.....	6
第三章 清泉寺历史.....	7
第四章 清泉寺传统庙会.....	10
第五章 清泉寺拳术.....	12
第六章 清泉寺秧歌.....	14
第 二 篇.....	16
第一章 国共两种部队过境.....	17
第二章 建立村党支部.....	20
第三章 八路军 358 旅驻村袭击日军.....	23
第四章 军民反扫荡.....	28
第五章 支援解放战争.....	45
尾声 党的关怀.....	49

第一篇

引言

只泥泉隶属朔州市平鲁区下水头乡，是晋西北地区一个偏僻山村，位于晋蒙四县（平鲁区、偏关县、清水河县、神池县、朔城区）接壤地带，不仅有着悠久的民间文化历史，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这里曾是晋绥雁北地区的抗战指挥中心之一，也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后方，还是晋西北抗日队伍通往雁北、晋察冀、大青山、东北等抗日战场的重要通道。

1937年10月底，八路军一二零师政治部主任泔泗淇派民运科长饶兴为组长，带领张明才、吴文、王培续等十余名老红军深入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西山利民堡（今利民镇，当时属神池县）成立神（池）朔（县）抗日委员会，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抗日工作。老红军张明才带领刘冬生在只泥泉等村庄宣传抗日政策，发展秘密党员，建立秘密党支部。这里成为晋绥地区较早建立党支部的村庄之一。

1937年9月29日，八路军一二零师358旅716团副团长宋时轮带领雁北支队（宋支队）约300余人，首次路过只泥泉村临时休息；1938年5月20日，八路军一二零师358旅旅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带领716团团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等全体官兵，进驻只泥泉村。从此只泥泉一带成为八路军战士、抗日干部穿梭来往与晋西北与雁北、绥蒙、晋察冀等抗日前线之间的一个驿站和一条重要通道。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晋绥边特委、中共雁北地委、五地委、朔县中心县委等地方党政军机关先后迁居只泥泉行政村及周边村庄。抗战最困难时期，这里成为晋绥边区的一个重要后方和指挥中心。

1945年10月初，贺龙司令员率领一二零师358旅、独一旅和许光达纵队各一部，从晋西北师部驻地途径只泥泉村口北上。在只泥泉村口大沟湾临时休息时，贺龙司令员曾说，只泥泉等村庄，作为晋西北进入雁北通向绥远、晋察冀、热河以致东北的一个重要通道，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8年1月18日，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朔县主持“土改”纠偏会议期间，曾对绥蒙区党委书记高克林、朔县县委书记李登瀛等只泥泉居住生活过的同志说，只泥泉一带的老百

姓很苦，很朴实，很热情，这里的人民为保卫地县机关、保护干部、支援抗战立了大功……

1952年4月，党中央组织的老区慰问团进驻只泥泉，慰问团团长李登瀛曾深情地说：“乡亲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泥泉的莜面和土豆养育了一大批干部战士，这里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后方，是晋绥革命战士生活的摇篮，是中共晋绥雁北地委的心脏和中心……”

只泥泉村位于朔州市平鲁区正西部，距平鲁区政府所在地井坪镇80多公里，西与忻州市偏关县毗邻，西北隔秦长城与内蒙古清水河县接壤，南与忻州市神池县相望，古代为“三不管”地带。正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小地，偏僻山村，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厚重历史、纯朴文化。只泥泉（包括附近村庄）一带的历史文化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一”，即：一股泉水——清泉历史，一座山头——马邑山边塞文化，一座寺庙——清泉寺历史，一块圣地——晋绥革命老区历史。关于“一块圣地”将在下篇中详细叙述，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其他“三个一”。

第一章 清泉历史

只泥泉村史源于一股泉水，最初村与泉同名，均称“赤泥泉”。后来，村名改为只泥泉，泉名改称清泉。这股泉水的源头（泉源）位于只泥泉村东 1.5 公里山沟内马邑山脚下，是一股天然泉水。清代以前，这股泉水四季长流，从未断流，可供泉水流经各个村庄的人畜饮水。因泉水开始流经的 1.5 公里小山沟沟底全是赤褐色胶泥（当地人称红胶泥），泉水与赤泥混在一起，人们便称为“赤泥泉”。赤泥泉从东向西，在只泥泉村西与偏关县教子沟、上纸坊两村沟内流出的河水合为一处，折向西北，在上土寨村（今属偏关县老营镇）与关河上游（即偏关河）汇合，向西汇入黄河。民国年间，泉水逐渐减少，时断时流；抗战爆发前，泉水更少，只有泉眼附近形成面积不大的一片水滩，山沟内除雨涝季节偶有山洪流经外，平时成了干涸无水的石头沟。

由于清泉的悠久历史，赤泥泉（只泥泉）村的历史也比较久远。村庄共有三个地址。村庄第一个遗址位于今只泥泉村西北 1 公里处的庄窝湾。这里背靠西山（寨山），面迎泉水，地下有瓷器、生活用品、人类头骨等遗物，庄窝湾对面有废旧井眼一个，故名枯井湾。从这一废村遗址遗物看，这个赤泥泉可能在秦汉时期已经存在了，当时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居住。村庄的第二个遗址位于今只泥泉村东南 300 米处的小庄阳坡，这里背风向阳，四周高中间低，适宜人类居住。这个废村可能是宋元时期的村庄。村庄第三个地址，也就是现在的只泥泉村。明初，赵氏移民定居于此，垦田种地，发展至今。明后期，赤泥泉改为只泥泉。不过，对于“赤泥泉”的称号，在清朝时一直沿用，如光绪元年（1875）双碾乡乌龙洞“重修碑记”中，布施人员赵发源、赵富源兄弟后注明是“赤泥泉”人。

只泥泉村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隶属朔县。明时归朔州卫右所，清顺治十六年（1659）撤销朔州卫，并卫归州，右所改为右里。民国时朔州改朔县，下设五个区，只泥泉属四区（区公所在下水头）。1940 年 1 月，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设四个区 36 个行政村，辖 366 个自然村。只泥泉设立行政村，辖只泥泉、龙须沟、麻地沟、南辛庄、信虎辛窑、下纸房、韭菜庄 7 个自然村。1951 年 8 月，朔县、平鲁县对行政区划进行重大调整时，原朔县四区划归平鲁县管辖，改为平鲁县七区。1953 年 4 月至 8 月，平鲁县 7 个区改划（下设）68 个乡，只泥泉行政村改设只泥泉乡政府，仍辖原 7 个村庄。1958 年 5 月，平鲁县 68 个乡并为 30

个乡，只泥泉乡辖 14 个村庄：东（东山上）、韭（韭菜庄）、下（下纸房）、窑（信虎辛窑）、只（只泥泉）、南（南辛庄）、龙（龙须沟）、王（王家窑）、麻（麻地沟）、刘（刘辛庄）、老（老此沟）、张（张家山）、小（小松沟）、丰（丰台洼）。2002 年 2 月撤销只泥泉乡，原辖 14 个村并入下水头乡。

第二章 马邑山边塞文化

只泥泉村东的清泉（赤泥泉）发源于马邑山脚。马邑山绵延数十里，北起张家山、小松沟一带，南接偏关县南场、北场，与朔城区利民、神池县及宁武县阳方口一带山峰连为一体，是管涔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邑山因水分充足，故林木旺盛，植被繁茂，适合放牧养殖。从马邑山的名称看，与牧马、邑马有关。据老人们讲，过去传说秦始皇派人来此放过马。这一传说尽管无从考证，但这里一直是朔州的西部边界，这是不争的事实。秦时，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在朔州养马，筑马邑城，时置马邑县，民国朔州改朔县时，撤马邑县并入朔县。马邑文化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她是朔州文化的精髓，也是三晋文化的重要内容。马邑山的由来，极有可能与蒙恬在朔州大地养马抗击匈奴有关。

马邑山作为朔州西部屏障，军事位置尤为重要。站在山腰，向北眺望，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蜿蜒连绵，横卧天际；向西看，上纸房、教子沟村顶的内长城（明长城）近在咫尺，仅有 10 公里左右。明代这里更是北防元蒙的重要防线。成化十七年（1481），设平虏卫（清雍正三年改为平鲁县），平虏卫以马邑山、赤泥泉（清泉）为界，赤泥泉村东、马邑山以北的山头取名平虏卫洼山，后简称卫洼山。卫洼山从沟底到山顶依次叫头道洼、二道洼、三道洼、四道洼、五里梁。马邑山西部山头（小虎头山）设立烽火台一座，这一烽火台位于只泥泉、信虎辛窑、教子沟、韭菜庄四村中间的山顶，居高临下将 4 村尽收眼底。烽火台还可瞭望到南堡、火烧洼堡、老营堡、贾家堡（今均属偏关）及乃河堡、白道沟寨等堡寨分管的村庄范围。以马邑山为中心形成了烽台相望，堡寨相依的情报网、军事点。只泥泉村西山头叫寨山，洞内至今有士兵住过的痕迹。只泥泉村北的菜洼山有一大石窑，相传明代兵士在此住过。这两处天然山洞，在日军扫荡时，还是晋绥雁北及朔县党政机关干部、伤病员、群众的藏身“窑洞”。

第三章 清泉寺历史

清泉寺位于马邑山脚下、清泉对面山坡上，因泉而名。清泉寺的历史较为久远，明成化十五年（1479）重修（清泉寺）观音殿记：“……成化丁酉岁，释子志万因游是，屡窥覩残石，基寨见存，发心重建……”又据清光绪九年（1883）重修清泉寺碑记：“……如我郡清泉寺……创之不知何代，修之在明则于成化间，在我朝则康熙、道光时俱有补葺……”由上述记载可知，成化丁酉年（1477），僧人志万，云游到此，发现庙宇根基残石，便倡议重修此观音殿。“根基残石”说明至少在1477年前100年左右，即1377年左右就有清泉寺了。另据村中老人代代口传，清泉寺最初叫后福寺，位于马邑山下、清泉后面，因山洪冲垮毁坏后，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这个传言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一是从“后福寺”名称看，完全有可能是跟着朔州崇福寺起的名。因为从方位上看，只泥泉位于朔州西部，过去东为上、东为前，西为下、西为后，“后福寺”的“后”即指位于崇福寺西。这也进一步说明马邑文化在朔州地区的影响之深远。二是当时建立寺庙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崇福寺的某一云游僧人，看中了这一有山有水的“风水宝地”，作为修身养性的“世外仙境”，在此建寺修养，弘扬佛法。朔州崇福寺最早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678），盛于金代。如果清泉寺之前真有过“后福寺”的话，说明其历史更加悠久，可能存在于宋金对峙时期。另一方面，当地的老百姓为祈雨而建。西山地区十年九旱，尤其是夏天雨水更少，严重影响庄稼的收成。相传，有一年夏天旱情特别严重，赤泥泉一带草黄土干，庄稼枯萎，靠天吃饭的人们便决定到马邑山下的泉眼旁祷告祈雨。赤泥泉（只泥泉）、信虎辛窑、韭菜庄、东山上等村便备了猪、牛、羊三牲祭品，从朔州城崇福寺请来一位长老主持仪式。祈雨仪式从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进行了三天，第三天正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救命雨”从天而降，连续下了十余天，西山地区旱情顿减，农业喜获丰收。为此，当地人便建起了后福寺，年年在六月十三这天举行祈雨活动，崇福寺的长老便住进了后福寺。

后福寺因山洪冲坏，迁址并改名清泉寺，具体年代不详，但清泉寺有碑可记的大型重修或维修有三次，第一次明成化十五年（1479），重修观音殿，清康熙、道光时俱有补葺；第二次是清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筑有正殿（大雄宝殿）、玉皇、观音、关帝、圣母、财神、马王、牛王、药王、土地等12殿，建有钟、鼓楼，寺庙对面、清泉东侧建有戏台一座（《平

鲁县志》载清泉寺始建于嘉庆十一年，有误）；第三次是清光绪九年（1883），重修观音殿、关帝庙、地藏殿、伽蓝殿、马王庙暨龙王庙、钟楼、石壁焕然一新。同时，正殿院内有一棵天然古柏，高4丈有余，径粗1米，挺拔直立，形似巨伞，与对面的泉眼遥相对应，是清泉寺内一大景观与奇观。

清泉寺的悠久历史及当时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从仅有的两次重修碑记中可以看出。1479年“重修观音殿记”中载，重修观音殿修造僧为志万和尚、门人洪统、洪镇、洪瑄、洪钊、洪铭、洪钺、洪铠、洪钳，以及善友崔普斌、野裕崢、宽净庄，首座志顺，监寺志镗、维那善玺、弘杲；参与修建的僧人主要有：重教寺志栋等5人，朔州崇福寺僧正司僧正庆、古山、住持鸾凤山等12人，岢岚州僧正司署正维，兴县洪福寺住持志信等11人，崇兴寺住持洪德等5人，观音寺本玺等3人，千佛寺直苑，百佛寺本海，开庆寺住持宗澄等5人，悬空寺性空、净玉等5人，昆卢寺原胜等2人，福延寺开泰；参与重修的地方官吏有：钦差守备山西行都司朔州卫少监王列、都指挥佥事钱泰、指挥同知王礼、千户薛瑞等3人、百户刘威等5人。可见，清泉寺在明代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朔州本地，成为周边寺庙联系密切的佛教圣地之一。

由于清泉寺佛教圣地的影响，只泥泉及其附近村庄形成了一股信佛向善的潜然文化。各个村庄或大或小、规模不等地建起了简易庙宇和戏台。村民们遇有过节、婚庆、丧事等重大活动，如因农忙或雨雪阻路、气候异常等情况进清泉寺不方便时，便在村中的土庙或石庙中举行祈祷等佛事仪式。尤其是只泥泉村从东、西两条主要街道（称东、西黑廊）到村庄顶端梁顶（后称庙圪旦），共建了14个庙。仅梁顶庙圪旦就坐北朝南建有11座小型石庙：居中龙王庙，东为三官爷庙、河神庙、马王庙、十王庙、城隍庙，西为三义庙、娘娘庙、牛王庙、孤魂爷庙、土地庙，11座庙对面建有坐南向北的戏台一座。

抗日战争时期，佛教圣地成为革命圣地。塞北工委、朔县中心县委在这极其隐蔽的山沟，利用现成的僧人居住过的窑洞办起了粉坊、豆腐坊、战地救护站，还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这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和后方，成为晋绥边区一个重要的指挥中心和伤员疗养所、干部生活学习中心。1967年1月7日，平鲁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只泥泉公社的红卫兵小将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清泉寺这个“封建社会的象征”、“旧社会的遗物”宣战。于是砸塑像、拆戏台、打石碑，清泉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仅存僧窑6间及庙群、戏台遗迹。不过，“文革”期间，只泥泉公社在废庙旧址上用石块、木材盖起了新式农业中学教室，这个教室在大型活动时还兼有戏台、主席台的功用。原来的僧窑被作为学生宿舍合理利用了起来。学生们在年轻校长杨富（曾任中共应县县委书记、朔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等职)的带领下,在这青山绿水山沟内一边学科学知识,一边种试验田、放羊喂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农村广阔的天地奉献青春年华。

第四章 清泉寺传统庙会

传统庙会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泉寺传统庙会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曾对晋西北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纵观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雏形时期，从元后期到明成化年间。庙会主要内容是祈雨活动。每年在农历十三这几天，周边村庄的村民代表齐聚清泉寺，由寺庙长老主持，举行较为隆重的祈雨祭天仪式。同时各村表演自编自练的地方小秧歌、二人台（山歌）对唱。

第二阶段是发展时期，从明中后期到清光绪年间。庙会主要内容是祈雨、唱戏。这一时期，庙会初具规模，参加的群众逐年增加，主要形式是祈雨仪式和唱大戏（折子戏）。戏班主要来自朔州大秧歌、神池道情、河曲二人台等。同时，庙会期间还伴有牲畜交易活动。

第三阶段是成熟时期，从清光绪九年（1883）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止庙会。庙会已由寺庙主持、群众自发参加，变为四村联合办会、群众有组织参与。光绪九年（1883），僧人本善应邀到清泉寺颂咒礼佛，“观其佛阁几摧，经楼将废”，“遂欣然以修葺之务为先。”义士赵永吉（双碾乡黑家辛庄人，在信虎辛窑置地立业）“素称募义摒财好施”“乃出资施工”。当时，赵永吉、赵永厚兄弟领头，信虎辛窑、只泥泉（赤泥泉）、东山上、韭菜庄四村为主，其他村庄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将清泉寺修葺一新。重修清泉寺推选出的8位经理是当时出钱较多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乡间绅士、义士，这8位经理是：贾怀月（东山上）、赵永吉（信虎辛窑）、赵富元（只泥泉）、刘珠（韭菜庄）、黑光清（东山上）、赵永厚（信虎辛窑）、尹昭功（韭菜庄）、赵红（只泥泉）。当年清泉寺六月十三庙会便从四村选出“四大经手”（负责人）贾怀月、赵永吉、尹昭功、赵红，联合组织传统庙会。从此，四村联合办庙会成为定局，传统庙会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众性民间活动。庙会的内容逐渐演变为骡马交流为主的交流会。

第四阶段是繁荣时期，从1944年恢复庙会到1967年再次中止庙会。1944年7月30日至8月2日（农历六月十一至十四），驻扎在只泥泉村的朔县中心县委、县政府，为了交流物资，活跃根据地经济，引深大生产运动，组织举办了因日军入侵而中断了7年之久的清泉寺庙会。这次庙会不但交流了物资，促进了生产，发展了传统文化，而且凝聚了力量，增强

了团结，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必胜的能力和信心，受到了驻只泥泉村的绥蒙行署副主任苏谦益的当场表扬和晋绥边区贺龙等领导的肯定。从此掀开了政府组织办庙会的先河。这一时期，庙会从民间转为政府举办，朔县县委、县政府连续组织举办 1944、1945 年两届庙会后，1949 年至 1952 年由朔县四区（1951 年 8 月改划平鲁县七区）和只泥泉行政村共同组织，1953 年至 1967 年由只泥泉乡党委、乡人民政府组织举办。庙会的内容已经演变为以驴马牛为主的牲畜和物资交流大会，助兴的剧团除了只泥泉等村的秧歌戏班外，主要有朔县、平鲁等县剧团。

第五阶段是复苏时期，从 1982 年恢复庙会到 2002 年撤销只泥泉乡。1982 年平鲁县决定恢复传统庙会，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农历六月初十至十四日）只泥泉地区恢复了因“文革”中断了 15 年之久的古庙会，仍由乡政府组织，地点改在了只泥泉村，名称逐渐变成了只泥泉物资交流会，传统庙会注入改革开放的活力，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文化复苏、经济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只泥泉物资交流会的规模开始变小，牲畜交易、物资交流已经很少，主要形式仅是唱戏而已。2002 年撤只泥泉乡，14 个村庄并入下水头乡，此后只泥泉物资交流会由只泥泉村自行组织，变为民办公助形式的民间活动。

第五章 清泉寺拳术

清泉寺最初的拳术只是寺内少数武僧内部演练，不外传、不流行，仅是用来防身护寺，强身健体而已。真正的拳术开始于民国九年（1920）山东平原县人张交叉入驻清泉寺，其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1931）拳术兴起阶段。张交叉（约 1874-1936），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人，自幼跟随拳师李长水（义和拳首领）练习义和拳。1889 年 10 月，15 岁的张交叉在李长水的带领下，参加了“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平原起义，不久由山东义和拳领袖朱逢明（朱红灯）直接领导，1898 年 12 月朱红灯被捕处死后，山东义和团于 1900 年转入直隶、北京一带，打出“扶清灭洋”口号，抗击“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镇压绞杀后，张交叉回山东老家一带隐姓埋名，过起了耕田种地生活。关于张交叉参加义和团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道，是他去世后，其子向师兄赵兴佑（黑老喜）口述的。外界人知道的流传最广的张交叉身世是：自幼外出学艺，闯荡江湖，27 岁（1901）回家于父母养鱼种田。民国元年（1912），38 岁的张交叉娶妻成亲，孩子 2 岁时，因村中豪强恶霸想霸占张交叉家中田地，将其父母、妻子 3 人打死，张交叉上诉无门，便将恶霸全家杀死，带幼子外逃流浪。1921 年五月间，张交叉带领 8 岁的儿子（人称“小侬侬”）来到只泥泉村。当时，正好清泉寺庙会连续几年，被朔县城一个地痞、脏痞、无赖霸占主持，此无赖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成为清泉寺庙会的一块阴影和山区民众的一块心病。张交叉了解情况后，自告奋勇，帮助清泉寺惩治这一无赖。是年六月十三庙会时，张交叉与无赖带领的拳师在会场戏台上展开了比武大赛，张交叉三局三胜，无赖大败而逃。从此，清泉寺庙会又回到了四村人的手上，张交叉父子定居清泉寺内。只泥泉等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在农闲时入清泉寺拜师学艺，清泉寺拳术逐渐兴起。

第二阶段（1931-1966）拳术发展繁荣阶段。张交叉入住清泉寺 16 年，前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很多，但张交叉所收徒弟并不多，因为张交叉收徒弟比较“挑剔”，有“三不收”，即：不孝顺父母者不收；德性不好，不讲义气者不收；办事不稳，性情浮躁者不收。众徒弟中比较出名的是只泥泉的“大五虎”与“小五虎”等 10 余人。“大五虎”是指只泥泉村的赵均、赵辛、赵兴佑（黑老喜）、张凡、赵堂，人称“五虎上将”。他们是张交叉的第一批徒弟，也

是成就较高、名气较大、清泉寺拳术的最早传播者。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赵均硬功无人比，张凡软功胜师傅，赵堂套路最花哨，十八般武艺数赵辛，敢闯江湖“黑老喜”。此外，张交叉还收了一些 12 岁左右的少年徒弟与其子一起练习拳术。少年徒弟中成就较高的有只泥泉村的乔梓、赵呼成、赵钰、赵振国、赵兴儒 5 人，人称“五虎小将”或“小五虎”。通过“大五虎”、“小五虎”的传授，只泥泉村家家尚武，年轻人个个练拳，清泉寺拳术不仅在当地发展繁荣，而且传入偏关、内蒙古、神池、平鲁等周边地区。抗战时期，只泥泉自卫队队员（民兵）大多会拳术，令扫荡的日伪军提心吊胆，吃尽苦头。

第三阶段（1966 年以后）萧条阶段。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泉寺拳术被作为“四旧”之一，禁止学习。学拳练艺的人逐渐减少，只有几个特别爱好者利用农闲时节的晚上到赵辛、赵博员父子家偷偷学艺。这一时期稍有成就的除赵博员外，主要有赵全、赵恒（赵博员长子）、赵博升、赵呼明、赵芝龙、赵和、杨斌、赵博智、赵峰等。同时，公社部分干部和学校个别老师也有偷偷学艺之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有个部分青年学生向赵全、赵呼明等学艺，不过人数越来越少，拳艺越来越差。

第六章 清泉寺秧歌

清泉寺秧歌是朔州秧歌的一个支派，有文、武两种。“文”即唱秧歌戏，最初的秧歌称“小秧歌”，是上庙祈雨时自编自唱的四句一段的小戏。这种小秧歌有点陕北民歌和河曲、内蒙古二人台的味道，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小秧歌简单通俗，现编现唱，见啥唱啥，是庙会初期的主要文艺活动之一。明清时期，随着朔州大秧歌的兴起和繁荣，清泉寺一带除学唱神池道情外，也开始学唱秧歌戏，特别是民国年间达到高潮，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学秧歌戏。主要剧目有折子戏《烈女传》、《乌玉带》、《辕门斩子》、《牧羊圈》、《三岔口》等，还有出子戏（小戏）：《赶脚》、《走西口》、《摸牌》、《观灯》等等。

“武”即是踢鼓秧歌，俗称“跑场子”或“踢鼓跑场”。这一文艺活动源于北宋末年梁山好汉董平来朔宁府（今朔州市朔城区）传授，在朔州大地较为流传。民国年间，只泥泉等西山地区广为流行。当时，以会拳术的赵辛、赵兴佑等为骨干，将踢鼓秧歌与拳术融为一体，使只泥泉一带的踢鼓秧歌出神入化，气势壮观。主要踢鼓套路有：小场子（2到5人表演）“双凤朝阳”、“小落帽”、“单挂印”、“双挂印”等；大场子（16人以上表演）“杀四门”、“满天星”、“梅花阵”、“五雷阵”、“引魂阵”等；过街场子“天地牌”、“双出水”等；拜人场子“大拜人”、“小拜人”、“单拜人”等。

秧歌戏与踢鼓秧歌相辅相成，一般上午表演踢鼓跑场子，下午、晚上唱秧歌戏，这一活动俗称“混玩意儿”或“起灶火”、“混秧歌”。民国年间，这种民间艺术已经趋于成熟，在晋北、晋西北一带，每年冬季请师傅教秧歌，次年正月初二至二月二走村串乡表演节目，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峰。当时朔县西山地区的白殿沟，下木角、下水头、辛按庄、白道沟、黑土咀、只泥泉等村庄的“玩艺”班最为有名。

只泥泉的秧歌班出现过三个高潮阶段，涌现出三批民间艺人。第一阶段即是民国十四年（1925）左右至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剧种是神池道情、朔县大秧歌、内蒙古二人台，主要艺人有赵辛、赵兴佑、乔梓、陈清杰、赵堂、张凡、赵二厚、赵兴儒、杨万华等。当时的秧歌队不仅起到了繁荣农村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宣传抗日、密切军民关系、鼓舞抗日士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文革”（1966年）禁止唱旧戏。这一期的身歌除了唱古戏还学唱一些新戏。主要艺人又涌现出了辛日成、赵铎、赵富（拴保）、赵兴国、

赵博如、赵甫、张勇（尹锁成）等。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即1979年以后。当时，在赵辛、辛日成、赵兴国等老艺人的指导下，以张勇（尹锁成）为师傅的只泥泉大队秧歌团再度兴起，而且成为八十年代农村经济复苏、文艺繁荣的标志和象征之一。张勇自幼爱好唱戏，“文革”前就是只泥泉戏班内的主要演员，曾跟随第一批艺人潜心学艺，并利用在朔县酒厂当工人机会到大秧歌剧团“偷偷”学艺。因此，他被村民们推为师傅后，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化，既教“文”（秧歌）又授“武”（踢鼓秧歌），先后培养出几批“土演员”，主要有范日增、张军、赵博蓬、赵恒、赵芝恒、赵博智、赵瑜、赵占国、李仙、杜仙、王金莲、李枝、赵呼明、张英、王金银等。他们的许多唱段曾被只泥泉公社、老营公社（偏关县）、水泉公社（清水河县）等广播站制成录影磁带，定期在广播节目中播放。只泥泉秧歌再度繁荣，并成为内蒙古、偏关、平鲁交界地带、长城内外一支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队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电视的增多和普及，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进城居住、外出打工成为潮流，学戏的青年越来越少，只泥泉秧歌后继乏人，逐渐衰落。